

清代今文经学的缘起

□ 黄开国

依照冯友兰关于区分子学与经学的观念,经学的确立开始于西汉武帝时。西汉经学的显学是今文经学,但东汉时古文经学的发展就超越了今文经学,汉代以后今文经学更是默默无闻,而在两千年后君主专制制度即将崩溃的晚清,今文经学却重新兴起,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今文经学在晚清的兴趣一时?

影响经学的变化因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社会政治因素。政治的因素常常从统治者眼前的现实利益出发,从政治需求出发来诠释经典,并通过诱以利禄等手段,来加强政治对经学的影响,政治与经学之间,不是政治要符合经典的原则精神,而是要经学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二是经学所依托的经典。经典所具有的原创性、权威性、法典性,使忠实于原著成为解经的第一法则,所以,历代经学家无不以“本义”“正义”等自我标榜。相对而言,现实政治对经学发展的影响尽管直接重大,但最终不能决定经学的发展之路,对经学发生深远、决定性影响的是经典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导向。即使现实政治使经学发展出现曲折的变化,但经典最终会引导经学归于正常。

梁启超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提出“复古”之说,以清代经学是一个不断向以往历史回复的过程,乾嘉汉学是复西汉之古,今文经学是复西汉之古。按照这一说法,清代今文经学似乎出现在乾嘉汉学之后,其实,在乾嘉汉学盛行时,就已经有庄存与等人讲今文经学。只不过与晚清的今文经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内容。晚清以前是照着讲,晚清则是接着讲。照着讲只是对汉代今文经学已有理论的阐发,没有对汉经学与现实结合的广阔精神,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内容;接着讲则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对经学作出结合现实的创新发展,带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时代特色。论清代今文经学的缘起,必须区分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而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的出现,都是由经学自身发展内在逻辑所决定,也与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

国学漫谈

《大清会典》的形成

□ 宋 睦

清朝享国 268 年,其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等方面都达到了古代中国的高峰,而这些制度也进一步对其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其中《大清会典》的编纂,就是清朝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

清代官方事务,无论案件审理还是行政处置,均讲究于法有据。其中前者以大清律例及各类地区律例为基准,而后者则以会典与部则例为基准。关于会典,目前存世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所编纂的版本,最早的康熙朝会典编纂于康熙二十三年,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然而会典修成前,清朝的官方事务如何运作?是否如某些学者主张的“存在‘崇德会典’”?对此史学界一直有较大争议。

日前,笔者在理藩院满文题本中发现一份材料,记述了顺治十六年理藩院处理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请求皇帝为其寺庙敕封庙宇一事的办案过程。整件事情并不复杂,但通过这一处理过程,让我们意外窥见了清初关于明代档案留存与使用的相关信息。可以说这份题本帮助史学家厘清了很多清初的行政流程,也能借此推知有关清代会典编纂的种种史实。

顺治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理藩院代锡勒图库伦旗扎萨克喇嘛(jasak i lama)察罕达尔汗维尔济(cagan darhan corji)奏禀皇帝书信一封,信中大意为:其本人于清太宗时投奔,彼时朝廷创立锡勒图库伦旗,本人也受任扎萨克喇嘛,今年过七旬,因感怀先帝恩德,建庙宇一座,为乞祈福,如今此庙尚无名号,故请今上敕封庙名。作为报答,将在庙内立功德碑一座,敬书其事。

清朝在入关之后,不但保留了部分形成于关外的特色机构,还最大程度继承了明代形成的政治运行模式与文书行政制度,理藩院与题本制度就是二者的最佳代表。理藩院形成于关外,初创时叫作蒙古衙门,专司处理与蒙古相关往来事务的机构,崇德三年更名理藩院,此后职权不断扩大,举凡蒙古、西藏、卫拉特等边疆地区事务,甚至包括与俄罗斯人的往来,都需经理藩院处理,是清政府中独具特色的重要衙门之一。

由少数民族的满人所建立的清王朝政权,面对着以汉族为绝大多数人口的被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来防止人民,自康熙初年就不断上演一幕幕文字狱的冤案。清王朝的文字狱虽然有严厉镇压一切反满情绪的政治诉求,但还不同于否定文化的文化专制主义。历史已经证明,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与经学的一个王朝,不仅推行“崇儒尊道”的文化政策,还开设博学鸿儒科,以“稽古右文”相标榜。皮锡瑞曾从经学史的角度将清王朝称为“经学复盛时代”。在这样的软硬两手的文化政策下,清王朝的早中期虽然不是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却也是大师辈出、文献整理成就最为辉煌的时代。

一代有一代之学,清代经学与以往经学的最大不同,是从宋明经学的重视四书之学变为以《尔雅》《说文》为经典,出现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新经学。清王朝的文字狱固然对清代经学的出现有直接影响,但还不是清代新经学出现的根本原因。清代新经学出现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中国经学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依经学发展史上典籍训诂变化的不同,我将经学分为三个时期或三派:从汉到圣为第一期,是以诠释五经为主的学派;宋元明为第二期,是以训诂四书为主的学派;清代为第三期,是以《尔雅》《说文》为据的学派。可称之为五经学派、四书学派、尔雅学派,用通行的术语来表示,就是汉学、宋学与清学。汉学主要是从政治方面,从五经中寻找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关注的中心是王道;宋学主要是从四书中,发挥道德伦理学说,天理、心、性等成为最重要的术语;清学以考证经典文字、名物制度为重点,重在训诂考据的成就。

就经学的义理而言,不过内圣外王两大方面,可以说,经过汉学、宋学的发展,内圣外王的理论已经发端殆尽,不可能再讲出什么新东西,只能在以前只是经学附属的小学去拓展新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学以训诂考据为中心乃是经学两千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只有到了具备成熟的社会条件整理经学文献,以及经学

的发展在文献整理的领域能够作出巨大成就的时候,才会出现清学的历史辉煌。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内在逻辑,即使清王朝再厉害的文字狱也不可能创造出有巨大学术成就的清学。

以训诂考据为主干的清学的出现,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前只是用来为经典的义理作文字说明的小学,摆脱了对经学义理的依附地位,而得以独立开来。这不仅是经学发展史上典籍训诂的历史变化,而且是经学史上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转变。这一变化,透露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信息:经学义理的阐发已经走到尽头,经学的发展只有在典籍的文献整理上才会有所作为。而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典籍文献整理,即使没有西学传入中国的影响,也必然会从传统的经学中分化出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校讎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西学的传入则加速了经学的这一分离。

清代最早出现的照着讲的今文经学,是作为清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魏源,他们的治学方法、话语范式等,与当时的清学家别无二致,都是从整理已有文献、学术的角度,对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刘逢禄的《释例》发明何休之学,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发明西汉之学,都是典型的代表。所不同的是照着讲的今文经学重在已有经学义理的说明,而不是以训诂考据为重点。而当清学在训诂考证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后,整个经学的发展无论从义理上,还是从名物制度的考证上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余地了。可以说,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发展到此时,已经面临不得不终结的历史命运了。

为什么晚清还会出现今文经学照着讲向着讲的发展?这是因为,历史发展需要更新新理论,但新理论还不具备出现的成熟社会条件,而不得不到已有思想库去寻求理论资源的艰难抉择。中国历史发展到明清初,就已经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与此变化相应的是思想文化领域新观念的出现。尽管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被清王朝的入主中原所打破。然而,历史的向前发展是不可阻挡

的。在经过一段曲折的发展之后,历史又会重新提出清初以来被淹没的问题。但是,正如一个难产的婴儿,不同于顺产的婴儿一样。中国近代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难产的坎坷过程,它不仅内部受到顽固派的极力反对,还受到外部西方列强入侵的打压,重重的阻挠压制,使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成长。正是这种难产,使中国在晚清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新思想文化,不能以正常的形态出现,而只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晚清接着讲今文经学的出现,就可以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晚清代表中国社会变革的新兴力量,一方面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正如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独立的思想一样,这些人在思想文化上不可能提出一套与旧制度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只能倚赖中国旧有的思想文化,从中去寻找其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汉学的古文经学以经典为本位,宋学讲心性之学,清学重训诂考据,都缺乏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契合点。只有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不仅与政治有紧密联系,而且具有经学诠释学的极大灵活性,这些独特价值,使今文经学在历史上可以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同样也可以成为否定旧制度的理论工具,或成为挽救旧制度的理论稻草,而成为晚清最适合曲折表达各种社会需要的理论形式,这就是晚清今文经学接着讲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但是,无论是希图从今文经学中找到救世良方的接着讲,如廖平的尊孔尊经,还是为维新变法的接着讲,如康有为的旧瓶装新酒,都以失败而告终。晚清接着讲的今文经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不是西汉今文经学的简单回复,如果说西汉今文经学能够很好地完成时代赋予的理论任务,那么,晚清的今文经学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的有效理论,而只能曲折地表现汉武帝以来经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

国学动态

自从王阳明创立并传播良知学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儒林传》)。阳明后学中有成就者如过江之鲫,盛况空前,成为明代中后期儒学发展的主流。阳明后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阳明后学是指与王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的弟子,覃及再传、三传等,具体而言,主要指列入《明儒学案》的浙中王门十七人、江右王门二十人、南中王门九人、楚中王门二人、北方王门七人、闽粤王门二人、止修学派一人、泰州学派十八人,共计八个门派,七十六人,并可扩展至有明确阳明学师承关系的学者,如孙应鳌、李贽、邹守益等。广义的阳明后学包括在学统方面与阳明后学联系紧密,如林兆恩、虞淳熙等,还涵盖阳明讲友湛若水后学中摇摆于湛门、王门之间的唐枢、何迁等,乃至由此脉络发展出来的许孚远、冯从吾、刘宗周、黄宗羲等后学。

阳明学是明代的显学,既有风行天下的展开,阳明讲会兴盛,良知异见纷呈,精彩迭出,也有未流猖狂自恣,渐失阳明之传。阳明后学文献积累数量庞大,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而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是深入研究阳明学的基础。进入清代后,由于学风转变和政治高压,许多阳明后学文献在国内遭到禁毁,民国期间,虽有所重视,但鉴于当时形势所迫,无力大规模整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提上了日程,其成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某一学者为对象,搜集整理类似个人全集的文集;二是以某一文集为对象,尽可能收集其他传世版本校勘,最终形成该文集精校本。第一种形式的代表成果有容肇祖整理的《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60年)、黄宣民整理的《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种形式的代表成果有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的《焚书》(1960年)、《续焚书》(1961年)、《初潭集》(1974年),李剑雄整理的《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这些成果整理的质量很高,为后续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典范。

本世纪以来,随着阳明后学研究的迅速发展,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出版成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2007年,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一编),共收录文集七种十册,分别为:《徐爱·钱德洪·董溪集》《邹守益集》(上、下册)、《欧阳德集》《王畿集》《袁豹集》《罗洪先集》(上、下册)、《罗汝芳集》(上、下册)。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二编),于2014至2015年陆续出版了《薛侃集》《黄绾集》《刘元卿集》(上、下册)、《胡直集》(上、下册)四种六册,即将推出《张元忬集》《王时槐集》《北方王门集》三种四册。此外,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项目列了十余种阳明后学的单部精校本,包括袁豹《袁双江先生文集》、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欧阳德《南野先生文集》、罗汝芳《近溪子集》等,这些文集正陆续出版。

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极大促进了阳明后学的深入研究,如依据江西颜氏家族珍藏的《颜山农先生遗集》整理而成的《颜钧集》,李学勤在序言中称之为“是我们三十多年来屡次访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为阳明学在民间的演化推进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又如国内早佚、仅见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泰州学派邓豁渠的《南询录》,岛田虔次、荒木见悟相继研究,由黄宣民、邓红相继点校出版,深化了学界对所谓泰州学派“异端”的认识,而这些重要的阳明后学思想文献并未出现在学界奉为圭臬的《明儒学案》中。又如能够推原阳明未竟之旨的再传弟子万廷言,《江西通志》称其平生著述多有所发明,有《学易斋前后集》《易原》《易说》等若干卷,其书皆失传。但张昭炜经多年搜集,点校整理了万廷言的《学易斋集》二十卷(国家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学易斋集》十六卷、《易原》四卷(附《易说》二卷)(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学易斋语约》二卷(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以及在南昌调研考察中发现的万氏族谱中造命、传记等珍贵资料,汇集成《万廷言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国内,影印古籍也推动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围绕《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了为数不少的阳明后学文献。在日本,位于九州大学出版社的中文出版社与九州大学合作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宋明古籍,由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任主编,在台北与京都两地刊行了《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四编”),所选的版本均为和刻善本,每种书前均附有冈田、荒木、佐藤仁撰写的序言撰写的解题,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初编”“续编”“三编”收录宋明理学典籍,包括《龙溪王先生全集》《王心斋全集》《近溪子明道录》等阳明后学相关文献。

由此可见,经过数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学界在点校整理和影印出版阳明后学文献方面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然而,相对于数量庞大的阳明后学文献来说,已有的成绩尚显不足,实有必要继续大规模整理出版阳明后学文献。有鉴于此,“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已完成策划,并通过了丛书编校体例,制定了工作细则及工作计划,总体上确定了第三编的具体选题:《泰州王门集》《陈九川集》《李材集》《邹元标集》《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集》《周汝登集》《陶望龄、陶奭龄集》《耿定向集》《唐枢集》《李本集》《杨起元集》。第四编包括《王宗沐集》《杨东明集》《管志道集》。除此之外,《泰州王门集》《杨起元集》转入第四编。目前,“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两编正在同步进行,共同推进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出版。

对于下一步的展望,将在现有成绩基础之上,继续扩大收集范围和创新整理模式,加强对海内外重要罕见版本、思想性强的阳明后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阳明后学文献遗散广,许多重要的著述按索不获,因此,对偶然发现的珍本、善本,应当尽快出版、惠及学界。经过几百年的文献流通,阳明后学文献的版本分散在海内外各处,查阅不易,结合已出版的阳明后学文献著作,以及第三编、第四编整理的成果,亟待全面普查散落于国内(含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欧美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阳明后学文献,形成“阳明后学文献著述考”。这项工作涉及版本、目录、考据等相关领域,从阳明后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入手,通读全文并了解海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而融会贯通,概括该文的内容主旨及其学术价值,并做出详细提要。提要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篇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的学术笔记,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高质量的提要不能仅是普通的介绍性文字,而是能在深入研读原典文献并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与独到见解,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的文献功底、宏观思想视野与微观考证功夫。

目前,国内不少省份的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社科机构对阳明后学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大气魄”“大格局”,在一种“学术健康”的情况下开展合作。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打造学术精品,文集编校者需要态度端正,勤奋刻苦,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沉潜研究,方能对阳明后学研究提供扎实的基础资料,精心打造传世之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